

【思想文化】

中西“文化”概念研究的反思

张在兴

(湘潭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文化在真正形成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之前,有其自身的启蒙过程,前后的临界点应当在 20 世纪左右,之前为文化概念或文化研究的思想启蒙,之后为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但在发展过程中,文化概念开始出现了自身的变异,即对文化概念启蒙的背叛,同时这种背叛是伴随着文化概念研究范式的危机进行的。

关键词:文化概念;思想启蒙;发展;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5)01-0005-04

Rethinking about the study of cultural conception in China and West

ZHANG Zai x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Culture had its own process of enlightenment before it became the normal conception and the objects of cultural study. Before twentieth century cultural conception thoughts were enlightening, after that culture study developed, but during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culture study, culture had its variations. These variations betrayed the enlightenment of cultural concep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odel of study had great crises.

Key words: cultural conception; enlightenment of thoughts; development; model of study

当前对“文化”概念作经验式梳理或单纯进行记流水账式地论述很能表明研究者进行文化界定时的无奈和困惑,生活中人们对文化“万能胶”式肆无忌惮地滥用,各种各样互不相干的简单词经常出乎意料地组合出现,但感觉又是相当地自然与合理,似乎任何与“文化”沾边的词语都给人一种高雅和深邃的错觉。我们可以以此责备学界对文化概念研究的不力,尽管现在文化概念已近百种或千种(数量并不等于质量);同时这也从反面要求我们必须对文化概念的研究进行通盘反思,即文化概念的思想启蒙到底是什么,启蒙后的发展是否蕴藏着变异——对启蒙的背叛,中西方在文化概念研究方面是否可比,现在研究方法有没有问题等。否则,文化概念的糟糕现状仍将延续甚至加剧。

文化概念思想的启蒙要涉及“文化”的词源学,但仅仅用词源学来阐释却远远不够,因为文化概念本身含有丰富的思想,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文化”成为专门术语,甚至 20 世纪初期文化研究成为专门学科对象,文化概念思想一直处于一种启蒙阶段;忽略了该点,词源学上文化概念的简单追溯将会与 20 世纪后的文化研究形成断裂带,需要填补断裂带的正为文化概念思想启蒙的内容。

词源学上,中西文化概念各有其侧重点和特色。中国的文化词源学多追溯于《周易·贲卦·象传》,“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至汉

收稿日期: 2004-06-21

作者简介: 张在兴(1958-),男,山东沂水人,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

代刘向《说苑·指武》中“文化”二字连用,“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再至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文”的含义,《易·系辞》曰,“物相杂,故曰文。”有错杂、纹路、物迹的意思,后发展为一种装饰审美、道德修养的意向;“化”有教育、变化、使有序等含义。“文化”最初是指把错乱的事物进行改进修缮使有序化,后发展为德行修养,人文教化等引申义,即西汉以后的运用。西方“文化”德语为“Kultur”,英文为“Culture”,两者皆源于拉丁文“Cultura”,而“Cultura”派生于“Colere”,有保护、耕作、培养、栽培、居住、锻炼、教育、发展、尊重等内涵,文艺复兴之后,人学勃兴,文化开始脱离原有的物质农业栽培含义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意识价值内容。可见中西方“文化”在词源学上都经历了一个由原始义到引申义的过程,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中西“文化”概念却是很不关联,甚至是分道扬镳了,尽管在中西方历史上都曾发生过与文化有关的灾难性事件。如果说在词源学上,中西方还存在一定可比性的话,那么在思想启蒙方面则主要是以西方为主,中国是缺乏甚至没有,有也只是阶级伦理领域意识形态的启蒙,而且该点的启蒙牢固而顽强地贯穿了整个单一历史形态,而此点上的差异也实际决定了整个20世纪中西方文化研究的不同走向。

文化概念的启蒙离不开欧洲的思想背景,并根植于古希腊——拉丁传统,这是由18世纪哲学家们处于对文化概念的贡献和对古希腊人政治思想的文化意义及其实践的阐释的临界地位所决定的,因为“翻译古希腊思想家们的著述,并使他们的基本观念,尤其是使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拉丁法学家们的基本观念适应于政治、精神和文化的新情况,是18世纪哲学家们的重要任务之一。”^[1]从格劳秀斯(1583—1645)到塞缪尔·冯·普芬多夫(1632—1694)再到后来的霍布斯、卢梭、康德和赫尔德,文化开始逐步奠定其深厚的根基。

普芬多夫首先将文化概念与人的自然权利概念进行了结合,初步赋予文化一定的道德内涵和自由理念,提出自然权利下的“道德实体”和人权自由领域“公民”与“人”的二重性,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直接指出了除政治法、民法及刑事法之外的第四种法律,“就是风俗、习惯,尤其是舆论”,“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2]很明显这属于

文化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总而言之,“18世纪文化概念的产生和演变与自然权利的孕育和确定是联系在一起的”。^[1]

在百科全书时代文化概念被在多方面以自由为根基将文化现实化,于试验、科学、艺术、文学、美学中得到普及;而康德与赫尔德对文化的道德赋予具有标志性意义,康德在考察“文化”概念时,将人的行为的道德根据和自由自律原则放到了重要地位;赫尔德主张文化有主观规定和客观规定,依据客观规定,“文化可以批判性地用于表示社会制度。文化也可用来表示风纪,或表示摆脱专制政府的意志。”^[3]赫还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这已初步具有了人类学和民族学文化概念的倾向。

在整个文化概念的启蒙过程中,自由与道德权利即人类本身应当具有的自然权利得到较高地提及和推崇,但是20世纪进入具有当代意义文化研究领域以来,文化自身内容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进入的是一个发展与变异并存的时代。

一

西方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化研究开始于19世纪后期,形成于20世纪前期,前者的标志是泰勒爵士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后者“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英美出现了人类文化学之后,文化才成为一门学科的独立研究对象”。^[4]尤其以1963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宣告成立,当代意义的文化研究才真正拉开帷幕,并涌现了一批带有奠基性的文化研究著作,如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等。此后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学界进行了颇具共识的有效划分,即初期的以《细绎》为中心的利维斯精英文化主义,后来为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时代,以及霍尔所指的文化主义之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出现,再后来即为所谓的“葛兰西转向”。

利维斯主义主张人们去阅读伟大的作品以接受精英文化的道德熏陶,这是一种文化精英守护式的自上而下的传播,霍加特则提出工人阶级应当有自己的通俗文化,将文化进行了阶级划分,威廉斯更是将文化界定成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社会下的文化充满了浓厚的悲观色彩,认为文化低劣复制机械炒作式的流行是对人民大众的侮辱和欺骗,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大众文化何去何从的问

题; 后来讲求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德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个体自由与自主的消解, 或者说通过认同主流的意识形态而看到主体的独立与强大, 这实际上是将个体降低到了附属地位, 而对个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有很大程度上的忽略; 阿尔都塞德对意识形态近似霸权的对大众的消解力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文化霸权的转向,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是将文化看成一种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在争夺中有认同、有反抗、有吸纳、有消解, 在这里更无从谈起个体自由与道德的概念的问题。

在各自的发展阶段, 随着文化概念思想启蒙的结束, 文化概念被赋予了不同内容, 拘促于精英与大众的离合之争, 深描于微观权力的运行, 做出的是现象之后合理性的假设解释, 这是一种发展; 但同时是对文化原本启蒙内涵的背离。整个 20 世纪的文化研究可以说是由人类个体自然权利方面的关注转向文化工业时代的大众群体文化分析, 在文化人类学中文化被赋予广义的模糊内涵, 在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中, 忽略了人类个体在其中的价值, 对个体自由进行了放弃, 或者说群体假自由代替了富有个性的个体真自由, 甚至是对“文化概念必须基于自由概念和世界概念”的偏向, 导致自由与文化形成了新式危机。

杜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是否掌握了先进的获取信息工具就会变得比乡下人对所获信息有着更强的分析研究能力? 恰恰相反, 信息越多, 越孤立, 最后造成的是“我们只好束手无策, 等待事物以出乎意外的、突然的、剧烈万分的方式降临到我们头上来”。^[5]而现实正是“人正在分为两类: 一类是制造信息的专家或机器, 另一类是对信息的真假性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3]由此文化被利用的可能性进一步大大加强, 人类的自由会被以更隐蔽的形式遭到侵犯, 而自由与文化的真正出路在于人类如何通过文化超越人的公民身份而达到完整的人, 这也是文化概念在新世纪面临的研究困境。

三

可能由于“文化实有的内容太复杂了, 复杂到非目前的语言技术所能用少数的表达方式提挈出来”。^[6]加之现实中学科的细分专业化, 导致严重学科壁垒, 文化问题出现时, 各个学科都想跳出来解决文化问题, 以转移学科困境, 认为自己的学科与文化紧密相关, 结果陷入的是你争我夺的泥淖, 并不是文

化本身具有所谓的跨学科特征, 更不是以所谓的模糊性为自己的特性。对文化概念的研究, 多数先追溯于词源学或权威文本的诠释, 然后, 要么是以形而上的话语解释, 要么是想当然地得出自己所谓的文化定义。

文化概念, 首先要提及的是 B 泰勒 (Bumett Tyler) 的标志性定义, “文化, 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7]不过这种整体“大杂烩”式的定义受到了一定挑战, 格尔茨指出这种定义“似乎是模糊之处大大多于它所昭示的东西”, ^[8]并将文化概念带入了模糊笼统的困境, 他认为, “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因此, 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践科学, 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8]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 (A. L. Kroeber) 和克拉克洪 (Clyde Kluckhohn) 合著的《文化, 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首次对上百个文化定义进行检讨。殷海光曾对其重新梳理归结出“六大定义模式”, 即记述的、历史的、规范性的、心理的、结构的、发生的; 而胡潇自己也总结出所谓“八大思维线路”, 分别为现象描述、社会反推、价值认定、结构分析、行为取义、历史探源、主体立意、意识解读。其它的界定如“文化就是社会化”或“文化的实质为社会群体精神”等仍然属于模糊性论述, 并且更重要的是忽略了个体自由与文化的关系, 因为在文化概念的理想范畴内, 群体具有的是现象描述的价值维度, 实质为个体文化理想化的实现程度, 而对个体自由与文化的忽略, 随着制度的无处不在和社会政治经济市场化中供远远超过求, 过多的选择反而限制了人的自由, 个体越来越可能成为群体的附庸或者说时髦和潮流的追逐者, 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强制。

文化, 按传统的界定方式必然会与人发生逻辑上的互动关系, 但是随着众多学科的细化尤其学科中的基础专业开始向文化靠拢, 形成了学科式界定, 那种视文化为人类特有的观点将受到新的挑战。加拿大学者 P 谢弗在主持世界文化项目时曾写成长达 60 页关于文化概念的纲领性文献, 其中按学科分化提出了十种并存的文化概念即哲学的 (传统的)、艺术的、教育学的、心理学的、历史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生物学的甚至宇宙学的, 尤其后两种将文化扩大到了物种范

围,生物学上的典型定义为,“文化是不同物种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9]宇宙学的定义则认为,“文化一般是指物种,特殊的是指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物,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9]而且这种跳出人本主义的界定方式得到了有关人类最新研究成果的佐证,即“人类的道德直觉源于进化”,“灵长类动物不像人类那样会推理,但看起来也能进行道德判断”。^[10]自然界的某些动物尤其是“人类的近亲猴和猿也具备大量的文化行为”,^[11]这为文化的泛化提供了可能。而上述的文化学科式界定也只是暂时适应了学科强劲细化的要求,采取的是一种无奈地分化定义,缺憾在于没有逻辑上的统一性,这与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Victor Hell)主张的“文化不应该和任何专业化概念混为一谈,不管它被称为医学文化、文学文化、哲学文化,还是科学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所谓文化概念,就是按其本来面目对文化进行思考,而不加任何限定词”^[1]完全相反。

文化概念的困境还在于缺乏界定观念上的一致性倾向,如果遵守一定的文化本身的界定原则,文化的滥用也不至于成为公愤。文化作为手段非目的,是价值判断非道德判断,如殷海光所说“我们把文化当作对象来看待时,不能对价值再做价值判断”,^[6]很多人说的文化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历史重建;其次,应当区分文化与文化现象,这源于现实中文化的滥用,而现在流行的文化研究只能称之为文化现象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人们迄今对‘文化’认识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混淆了文化与其表现即为文化现象,把文化现象想当然地直接当成了文化。”^[12]同时要注意走出当前的界定误区,以过分模糊的话语来界定模糊的文化只能给文化概念添乱,但也要防止为界定而界定走向单一化,更应当看到

文化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即避免“过分笼统地泛泛而论或过分简单地把文化视为一切所谓高尚活动的总和”。^[1]

现在,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与人类的关系开始达到了新的紧张阶段,而当前的文化研究却认同于转向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的新式权力运行,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假设文化概念研究应当存在转向的话,回归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思想启蒙是较好的价值选择,重新估价人类自由与文化的关系,以期复归文化概念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 [1] [法]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M].康新文,晓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2]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3] 汪家堂.“文化”释义的可能性[J].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40-46
- [4] 刘跃进.文化就是社会化[J].北方论丛,1999(3):46-54
- [5] [美]杜威.自由与文化[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
- [6] [英]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 [7] [美]克里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
- [8] 闵家胤.西方文化概念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1995(2):64-69
- [9] 卡尔·齐墨.人类的道德直觉源于进化[N].参考消息,2004-4-19(9).
- [10] [美]C恩伯.文化的变异[M].杜杉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 [11] 谢鸿昆,夏玉玲.传统“文化”概念的困境[J].社会科学论坛,2001(9):37-41.

[责任编辑 杨彬智]